

金融海嘯席捲 貨幣再與黃金掛鉤？

文／大頭

自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美元作為全球貿易和儲備貨幣的角色，並討論應否重新實行「金本位」制度。前美國「兩房」(房利美和房貸美)高級諮詢顧問、《貨幣戰爭》一書的編著者宋鴻兵，在2008年10月接受傳媒採訪時預言，當今頭號強國美國尚不能保證其主權貨幣信用的時候，黃金的重新貨幣化(或部分貨幣化)早晚會被提出，因此我們實需認真探討重行金本位的可行性。

「金本位」制度的起源

現今國際經貿體系主要以美元為交收單位，且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法定貨幣(註，見下頁)均以美元或以美元為單位的投資工具作為儲備，當美元的地位最終崩潰時，其他貨幣當然亦不能倖免。可是，以現今國際金融和貿易的規模，要重新採用金本位制，無論主客觀條件均有很大的限制，為此，必先要了解現代金本位制的背景。現代金本位制奠基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由於當時歐洲各國(特別是英國)對中國的貿易出現巨額逆差(入口遠超出口)，造成本土白銀(跟中國貿易的主要通貨)大量流失，英國一方面以出口鴉片往中國來扭轉此逆差，同時採用金本位制(即採用黃金通貨，並以英倫銀行發行能以固定價格兌換黃金的鈔票為法定貨幣)來穩定本土的貨幣和經濟體系。由於當時英國正進行工業革命，其商品廣銷世界各地，為維持跟英國的貿易及強化本身貨幣，各國陸續採用金本位制，形成首次以金本位制為主的現代國際經貿體系。

要實施金本位制，該國必須將其貨幣跟黃金掛鉤，容許其貨幣(鈔票)兌換相等於票面值的黃金，以及維持足夠的黃金儲備以作為其貨幣的擔保。由於當時各國跟英國(佔當時世界工業品出口超過一半)均持續有不同程度的貿易逆差，需要兌換大量英鎊以支付入口，從而使本國貨幣大幅貶值與及黃

金大量流失，因此，各國競相將其貨幣跟英鎊掛鉤，並向英國的銀行借貸，以維持貿易收支平衡。加之當時英國企業把透過貿易賺取的資金在世界各地大肆投資(同樣佔世界總額超過一半)，使以「各國貨幣 > 英鎊(國際主要交易通貨) > 黃金」為原則的金本位制(實則為英鎊本位制)在一段較長時期內得以維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因在戰爭中大量流失資金並向美國等國舉債，而失去其貿易大國的地位，使英鎊難以繼續扮演穩定金融的角色；取代英國成為主要債權國的美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其他各國則面對國內的龐大債務、用以重建的巨額赤字預算及高通脹等困境，使其同樣難以維持足額的黃金儲備來支持其貨幣的穩定，第一次金本位制終於1929年金融地震發生後不久終結。至於第二次金本位制，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1944年，由美國邀集各同盟國於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開會，針對二次大戰的起因 - 即因金融地震導致大蕭條，造成極端思潮(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抬頭，(轉後頁)



國風

2009年2月號 (非賣品)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
China Study Society, HKUSU

電郵：css@hku.hk

印量：1 000 份

(所有文章純屬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

捱過 2009 及以後

~ 當下中港社經形勢的挑戰與契機 ~



(中評社圖片)

第一擊：專題講座

嘉賓：李紹基博士(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潘小濤先生(商業電台中國時評節目《串》主持)

日期：12/2/2009(週四)

時間：12:30pm (諮詢攤位至 6:00pm)

地點：莊月明 G01

第二擊：研習小組 (名額 20 人)

日期：13/2 及 20/2(逢週五)

時間：7:00pm-10:00pm

地點：方樹泉 1A05

嘉賓：梁希倫先生(利豐投資(亞洲)有限公司投資經理)

查詢及研習報名：

Philip (9388 5685)

Sarah (9754 5670)

Email: css@hku.hk

商討並建立戰後的國際經貿體系，包括再次實行金本位制(改為「各國貨幣 > 美元(國際主要交易通貨) > 黃金」，即實則為美元本位制)、實行固定匯率、減少貿易壁壘(如歧視性關稅)、提供援助給歐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作戰後重建和長遠發展、以及建立 IMF、World Bank 和 GATT (WTO 前身) 等國際組織來確保和促進國際經貿體系按上述原則運作，此即「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以美國和美元為核心的第二次金本位制國際經貿體系一直運作暢順，及至 1960 年代初，美國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同時各國央行購買大量美債作為儲備而增加美元貶值的壓力，加之越戰令美國政府開支大增，種種因素迫使美政府於 1971 年將美元和黃金脫鉤及貶值，並於 1973 年將美元改為自由浮動，第二次金本位制(布列頓森林體系)因此而告終。

「金本位」制之共通點

縱觀上述兩次金本位制，有以下的共通點：

1. 實行金本位制的國家必須將其貨幣跟當時國際最強勢的貨幣(先後為英鎊和美元)掛鉤，而後者則跟黃金掛鉤，形成連鎖關係。
2. 維持足夠的黃金儲備來穩定其貨幣的價值。
3. 匯率必須保持固定(可間中作出調整，但幅度不能過大)。
4. 所有主要貿易國都必須採用金本位制。
5. 該強勢貨幣國必須長期維持貿易順差，並將多餘資金以借貸和投資等形式向國際經貿體系回流，以達致國際收支平衡。

當今之國際經貿體系

當今國際經貿體系跟前兩次實施金本位制時相比，有著重大差異：

- 一則各國貨幣發行總量遠超現有黃金的價值(以現時市價計算估計只佔約 50%)，如要維持足夠的黃金儲備以支持此貨幣規模，必然導致黃金價格大幅飆升，同時對黃金的原材料和零售市場造成嚴重影響。相反，如減少貨幣規模以符合黃金儲備，則會導致信貸收縮和經濟放緩，其對國際和國內經濟的衝擊，不容小覷；
- 二則由於政府必須維持一定數量的黃金儲備以穩定本土貨幣和經濟體系，將迫使其財政不能過度支出和借貸，以避免黃金的大量流失及引致貨幣大幅貶值，然而，這亦同時限制了政府在面對經濟問題時可供運用的財政手段；
- 三則第二次金本位制終結以後，以美元掛帥的信用貨幣體系之所以能維持至今，主要是基於美元的國際流通性、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及其龐大的金融市場和海外投資，一旦此體系崩潰，縱觀當今世界，要找到一個跟第一次金本位制的英國和第二次金本位制的美國相匹配的國家作為新金本位制的核心，並不容易；
- 四則現今國際貿易頻繁，貨物、服務、信息和資金的流通規模跟往日相比，不能同日而語，而各國的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亦不一致，要長久維持一籃子固定匯率，可謂不可能的任務。至於同時實行固定黃金價格和浮動貨幣匯率制度，亦將牽涉不少變數與及複雜的技術問題，並無先例可援。

美元信用貨幣體系終將無以為繼，未來五至十年，國際經貿體系將會進行重整，大河對岸的風光如何未可知。無論屆時採取完全或部份金本位制，或是其他的一些主張諸如能源儲備制，在推行時都將無可避免會出現一段長時間的波動，與及各種不能預見的情況。

實行「金本位」之困難

曾有意見認為，為了挽救人們對現時各國「假貨幣」的信心，恢復金本位是一種可行的選項，至於因此而導致金價大幅上揚，同時對黃金的原材料和零售市場造成嚴重影響的情況，

可通過行政命令，取消黃金自由買賣，將所有黃金和金礦國有化，由政府釐定黃金的劃一價格。這種意見建基於一個假設，即政府能有足夠能力控制黃金價格與及吸納足夠的黃金儲備以支持其貨幣發行，然而，它低估了在實行金本位過程中所會遇到的技術困難，以及各國經濟金融實力和客觀環境等因素。目前世界各國大多以外匯儲備作為其貨幣(通貨)的信用擔保，一旦實施金本位制，由於各國的黃金儲備量不一，為維持貨幣間匯率的相對水平，各國央行便需要購入一定數量的黃金以支持相若的貨幣發行量。為此，我們先看看現時位列外匯儲備頭十位的國家/地區，她們現有的黃金儲備相對於外匯儲備的百分比(參見國際貨幣基金網頁和維基百科相關條目)：

- | | |
|---------------|----------------|
| 1. 中國大陸 (1%) | 2. 日本 (2.1%) |
| 3. 俄羅斯 (2.4%) | 4. 印度 (3.3%) |
| 5. 臺灣 (4%) | 6. 南韓 (0.2%) |
| 7. 巴西 (0.5%) | 8. 新加坡 (2%) |
| 9. 香港 (<0.1%) | 10. 德國 (66.3%) |

(留意，上述 10 國只有德國位於歐元區。)

再看看位列黃金儲備頭十位的國家/地區，其現有黃金儲備相對於外匯儲備的百分比：

- | | |
|-----------------|----------------|
| 1. 美國 (78.2%) | 2. 德國 (66.3%) |
| 3. 法國 (59.4%) | 4. 意大利 (68.1%) |
| 5. 瑞士 (39.8) | 6. 日本 (2.1%) |
| 7. 荷蘭 (61.2%) | 8. 中國大陸 (1%) |
| 9. 歐洲央行 (24.8%) | 10. 俄羅斯 (2.4%) |

(留意，上述 10 國有一半(包括德法意荷和歐洲央行)位於歐元區。)



圖：1944 年布列頓森林會議

<www.un.org/UN50/Photos/un50-014.gif>

由於歐洲央行連同所有歐元區國家央行的總黃金儲備位列世界首位，而該央行所擁有的黃金儲備佔其外匯儲備的四分之一，如實行金本位制，只要集合眾歐元區國家之力，便能有足夠的黃金儲備，以支持現有歐元的發行規模。反觀其他國家/地區，特別是前述外匯儲備九強(德國除外)，因她們的黃金儲備佔其外匯儲備最多的也不過 4%(臺灣)，假使國際貨幣匯率維持現時的相對水平，她們的央行便需要四出「撲金」，才能維持其幣值，否則便可能要大幅貶值。當然，理論上各國均可自行訂定其貨幣跟黃金的固定兌換價，然而，倘若各國的黃金價格水平差異太大，必然會導致國際貨幣匯率在短期內出現巨幅波動，某些貨幣的價值可能會因此而水漲船高，而另一些則可能會直線下滑，甚至失控，其對經貿體系和民眾信心的衝擊，不言而喻。

由是之故，在「布列頓森林體系」(第二次金本位制)建立時，並非由各國自行訂定其貨幣跟黃金的兌換價，而是參照第一次金本位制的經驗，只將黃金跟一種貨幣(美元)掛鉤(固定於 1 盎司黃金兌 35 美元的水平)，而其他貨幣則統與美元掛鉤。當時美國擁有世上三分之一的黃金與及全球超過 65% 的官方黃金儲備(這是其在本土和南北美洲百多年來運用各種手段積累的結果)，加上其持續貿易出超(這是因其本土生產並未受到戰爭波及，而各國亟需其貨品和資金以恢復戰後經濟之故)，亦令美元成為國際經貿體系中最強勢的貨幣，使美元順理成章成為第二次金本位制的核心。如前所述，無論

是第一次或第二次金本位制，其運作的方式，都是以一種強勢貨幣跟黃金掛鉤，其他貨幣則與該強勢貨幣掛鉤，而最後同樣因為當該強勢貨幣的發行國面對持續貿易逆差和龐大財政赤字，難以維持其幣值的穩定，致令整個制度終結。

重建「金本位」的可能性

設若重建金本位制，一個可能性是參照前兩次的模式，選擇一種強勢貨幣跟黃金掛鉤，至於何者最終出線，除了貨幣本身的流通性和穩定性，同時要考慮到該貨幣發行國在國際經貿體系的實力和地位，而該國本身的意願(政治經濟考量)至為關鍵；另一個可能性是採用「全方位」的金本位制，即沒有核心貨幣，由各種貨幣自行跟黃金掛鉤，再讓市場將貨幣之間的匯率由目前的相對水平調節至新的平衡點，這種方式的難度較大，亦沒有先例可援，要「摸著石頭過河」。

現時各國的官方黃金儲備只佔世界所有黃金約兩成，其餘八成為私人持有。在這兩成的官方黃金儲備中，歐美佔有主要的比重。那個「國債世界第一」的美國，自第二次金本位制終結以來，一直以發行國債來支持政府財政和貨幣穩定，其所持有的大量黃金儲備(佔其外匯儲備接近八成)則始終「沉睡」於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諾克斯堡金庫(Fort Knox，即「鐵金剛大戰金手指」一片中壞蛋金手指(Gold Finger)密謀劫掠的目標)內，或許是其「未雨綢繆」的「先見之明」吧。相反，那些後起之秀如「金磚四國」(BRIC)的巴西、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則沒有此「得天獨厚」的條件，「金磚四國缺金磚」，實在諷刺。唯有印度，其人民傳統上對黃金有超乎常人的喜好，且向來不信任金融體系，因而該國的民間黃金持有量竟佔全球已產黃金總量的一成，倘若實行金本位制，印度或可將這些私藏黃金「國有化」，率先「軟著陸」。

縱使重行金本位制可能面對種種困難，然而，相較其他的一些建議如戰略能源儲備、一籃子強勢貨幣掛鉤等，以貴金屬作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仍舊是比較可行的辦法。基於上述各國黃金儲備量的懸殊不平等狀況，或可考慮改以鉑(Platinum，俗稱白金)作為貨幣儲備，一來鉑如金和銀般為世所公認之珍貴金屬且於市場流通，二來各國基本沒有鉑儲備(只有個別國家發行少量以鉑鑄造的普制貴金屬硬幣)，因而可在相對平等(幾乎全由零開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類似 IMF 的機制，由各國央行參與出資，根據現行各國貨幣匯率水平訂定鉑的兌換價，這可參考當年各歐共體(歐盟前身)各成員國將其貨幣綜合加權，建立歐洲貨幣單位 ECU(即歐羅的前身)的經驗，此外，該機制亦負責統一採購和分配鉑予各國央行。同時各國亦可考慮重新賦予金和銀的法定貨幣地位(其實各種貴金屬早已被分配有 ISO4217 國際標準貨幣代碼)，以增加市場上信用通貨的種類和流動性，屆時或會出現以金計價(單位為金衡安士 troy ounce)的信用卡也說不定。

重整國際經貿體系茲事體大，涉及各國綜合國力的消長，如何取捨，取決於各國對當前局勢的認知和對未來發展的考量，通過反覆磋商，縱橫捭闔，討價還價，最終達致大家都妥協但不一定滿意的結果。

也許我們可以效法 Orania(一群南非白人因不欲為黑人主導的中央政府管治，但又不想訴諸暴力，遂遷往這個內陸小鎮建立與世隔絕的社區，他們甚至發行自己的貨幣 Ora，該小鎮的「官方」網址是 <http://www.orania.co.za>)的經驗，一起到偏遠地區建立自己專屬的桃花園。■

註：根據 ISO4217，即有關貨幣及基金的國際標準代碼表，共有 178 個代碼，扣除 10 個國際基金/債券交易單位(例如 IMF 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與及 4 個貴金屬(金銀鉑鈾)代碼，另加 23 種未有列入該表的貨幣，現時世界上共有 187 種由各主權實體及其屬地發行，或根據國際協議(如歐羅)共同發行的法定貨幣(legal tender)。

趁中國復興之勢

文／白恩樑

「有智慧不如趁勢」是信報專欄作家曹仁超的名言。明白世界、中國、香港的大方向，才可以在事業、投資上走對方向，順風行舟，事半功倍。世界大勢，以中國的復興最為重要，經濟重心由美歐重回亞洲，特別是中國。對香港人而言，把握中國的發展是大趨勢大氣候，香港本地是中國大勢的一部份。香港和香港人可以在這大勢之內發揮其主觀能动性，影響自身的命運，乃至大趨勢的發展過程。

內地經濟發展的量變與質變

歷史告訴我們，經濟有其規律和循環，量變與質變交替而行，推動社會的整體發展。中國內地於一九七八年揚棄以政治為一切中心的制度，改革開放，經歷三十年，從經濟總量、人均收入、零售消費的總值追趕至西方國家六七十年代的水平。物質生活變得豐盛。改革開放的過程雖有起伏，總體是一切以改善物質生活為主線，堅持中共領導的一個體制。這體制從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〇年一直發展，從無到有、從少而多是一個量變的過程。今日，一般城市人的生活已經不是左支右拙張羅日常的必需品，滿足了生活必須以後，想的是如何生活得更舒適、更美好，內地的一般消費者開牌越來越重視品牌和產品質素，他們來香港買世界各地的優質商品。這時候，再多的便宜貨根本沒有市場。在供應面，只要增加生產線和人手，就能增加收入和盈利，有多大的投入就有多大的回報。但供應增加至有多餘生產力，便有九十年代起爆發「電視機大戰」、「洗衣機大戰」等廠商減價促銷戰。1999年的《中國工業發展報告》用上「告別短缺經濟」為題目。今天差不多每種商品在城市都是供過於求，今天國產汽車不過幾萬元一輛。到了去年，連出口市場亦見飽和，歐美市場衰退，加上金融海嘯引發的信貸收縮，考驗各行、各業、個人和企業在經濟領域的單獨生存能力，只有最具競爭力的個體和族群才能生存下去，小廠弱廠在競爭中被淘汰，強者得到新空間發展壯大，汰弱留強，適者生存，全社會向前進化。這「質變」的過程在2000年左右已經開始，到了2008年可以確認此種質變是全方位的。質變完成以後，就迎來下一輪的經濟的再次高速增長(量變)。

中國內地經濟的質變，不會單單是企業興替，還要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才可讓整個內地經濟發展上一個新的階梯，不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便會停滯不前。金融海嘯之中，內地算是進入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停滯期。這是好的，經濟方面汰弱留強之後，強壯的企業能更加壯大，新生的企業會有更多空間去進取發展。另一方面，在經濟困難時期，除了企業和個人為自己的生計求存而各施各法以外，政府被迫處理一些國民收入分配、社會制度的改革，同時大興基礎建設，為下一波經濟成長奠下基礎，完成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實現中華的復興。

通往「和諧社會」之路

中國內地的執政當局，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已經以「啟動內需」為主要政策。當時是以政府消費為主：投資基建、漲公務員的工資（邁向高薪養廉的一步）。在金融海嘯發生後，內地政府公佈四萬億人民幣的基建計畫，我認為這是啟動內需的第一波。金融海嘯直接衝擊內地的勞動密集型工業（注意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歐美經濟欣欣向榮，亞洲的衰敗卻間接令內地工業受惠），基層市民的生計直接受到傷害。由於打擊面十分巨大，政府的基建項目可能只是一服提神劑，不足夠解決問題。長治久安之計，亦為民生計，讓內地更多人民消費是恢復經濟增長的不二法門！鼓勵內地人民消費，政府推出了「家電下鄉」的政策，直接補貼農民購買家電。余以為，這又是權宜之計，因為買家電是一項「長期投資」，買了一次，

就要三五年或更久後才再買（我家有一台日本製的電冰箱用了三十多年）。而且，農村的供電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農民未必能背擔電力消費，得物無所用，浪費國家和農民金錢！

外國鼓吹減稅，卻不合我國國情，內地的富人和城市人已經富得肚滿腸肥，減稅再給他們錢，又可以消費多少？還不是拿去投機，或者流到外國去？況且過去幾年，國內城市的商品消費已經高速發展，城市人的生活水平與香港和先進國家可謂無分軒輊。靠城市人健康地消費所推動的增長已到極限，加上出口生產力轉到內需，產品供應已經過剩。唯一的出路是幫助屬於大多數的窮人（主要是農民和農民工）改善生活，讓「沒有的」去買東西，讓窮人也可以過上豐富的物質生活，一如外國人一樣。

內地政府和輿論有共識去提升人民的消費，已實施的方法很多。例如，增加社會保障和新勞動合同法實施更多對勞工的非物質保障（如間接的終身僱用條款），這些使人們對未來更有信心，減少儲蓄，增加消費。但經濟學研究顯示，只有永久性收入增長，人們才會增加消費。余以為，社會保障不能增加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的總收入（社會保障是收入分配），國家的財力亦未必可能負擔一個覆蓋全面而公平的社會保障系統，反做成更多地區之間的不平等和公共機構的貪腐機會。新勞動合同法令僱傭合同變得複雜麻煩，打擊企業招工的靈活性和積極性。阻礙經濟發展，實在多此一舉。（關於勞動合同法的經濟分析，可找張五常教授的文章學習。）內地應專注於可以增加可支配收入的簡單、直接和有效率的方法：持續地增加最低工資。但是，很多工商業老闆投訴勞工成本快速增加，反對漲最低工資。余以為，增加最低工資直接幫助社會最低層的生產力，讓他們消費以改善生活；其二，大部份有競爭力的企業的工資水平早已超過最低工資，漲最低工資可以加速汰弱留強，也迫使企業把更多利潤分配予員工；其三，工資是總工人成本的一部份，政府刻意忽視「稅」和「費」（收入稅、三項社會保障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住房公積金」和其他各式地方費用），並管理這些行政事務的開支，政府可以改革這些不具效率的體制，為企業省成本；其四，工資漲則消費漲，消費漲即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有銷路，銷情佳則有盈利，有盈利可再發展，再多請工人、再漲工資，農業農民也因此受惠，這就打開了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企業可算是「蝕頭賺尾」；其五，欣欣向榮的社會才安全，有錢卻要防綁票、住「高設防」豪宅、被一群保鏢包圍，這種自由與坐牢差不遠。

<http://sc.weebobook.com>



漲工資以實現均富，是通往「和諧社會」的簡單便捷之途。捨此而圖政府的大有為，讓政府分配更多國民收入，在我國的政治實況中是一個下策。在缺乏輿論和制約的政治架構中，再多的錢反而衍生更多的腐敗，有礙今天執政者的長治久安。

啟動政治改革的歷史機遇

政治改革可說是經濟再增長所必須補的大漏洞。改革開放至今，有所作為的企業和企業家不下萬計，他們的財富動輒以億算，但是，這一群企業家、專業人士的下一步是怎樣的想，何為優次？執政黨

的史蹟斑斑，建國初期有全國性的國有化，今日尚有官僚可以違法亂紀動用專政手段侵害私產，沒有私有產權和人身自由的保障，哪個人會在這個社會作長期的投資？

不論國內的企業家，還是外地的投資者，都只會作短視的打算，能撈多少就撈多少，懶理環保、科研、人材培育等等需要以十年計投資的項目。內地有能之士，非自己親身就是安排家眷移民外國，為的圖個外國護照作護身符。有這個外逃的心態，怎可能專心在內地發展事業？此外，作重大的長線投資必須對未來的環境多少有個估算，當內地的政治制度、傳承和長期穩定性是一個疑問的時候，誰敢大手投入這個市場，作以十年計的投資計劃？要改變代工生產的模式，進入產品開發、裝備和原料製造的行業，為管理系統升級換代，都必須要這種長期的投資，企業才能獲得新的、更強健的競爭力。同時，大額的投資必仰賴銀行金融的支持，而操作現代金融必須信息的流通、公平公正的交易環境，這環境需要政治改革、開放傳媒、公平的司法才能達致。累積來看，這些投資和改革就是經濟能否質變再上台階的要素。權衡利害，政治改革是必須的，是急切的。同時，經歷過文革的教訓，也提防「蘇東波」的翻版，穩定中循序漸進應是全社會上下的共識。我不相信八九民運式的運動能推翻共產黨的統治，更不相信一夕間推翻現政權對中國的短中長期任何一線有利。但每一個細步改革都是必須要爭取的，政治改革的試點應會在人們視線看不到的地方進行著，「摸著石頭過河」、「建特區」之法，在經濟上成功了，執政黨會再來一次嗎？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只要三兩個重點政策突破，其他讓地方政府在中央和輿論制衡下各施各法，就可以開出一片新天地。余以為，制約中國內地更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障礙為既得利益階級，以權錢交易尋租的官商共犯們。要壓伏這「反動」的力量，最重要靠每個公民在細節上不斷爭取，水滴石穿，讓公開的輿論陽光發揮其消毒作用。此外，執政當局的高層除了尋租「擺著數」之外，還是重視自身的歷史評價，也會考慮採取「必要的措施」來防止官迫民反。最近廈門和成都對興建化工廠的和平反對行動，反映了人民對自身利益的訴求有了自覺。官方不能如過去一樣說了算，民意的重量是一點一滴的增加。所以，上下的互動令我看到政治改革的希望。

有智慧不如趁勢

由於中國體積巨大，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水平，其自身的力量已足以左右世界大局的發展，由於核威懾，今時今日採用非和平、非經濟手段競爭往往與回報不成比例，由此觀之，中國再享二三十年和平建設的日子並非奢望。借此經濟低谷的日子，不論企業還是社會，應注重內部的調整，建立更剛強的體質，揚棄舊的沒有效率的一套，建立未來二三十年的基礎。生於這時代，是我們的福氣，因為未必再有下一個三十年的大浪潮讓人們乘勢而起。■

官方不能如過去一樣

說了算，民意的重量是

一點一滴的增加。

回應沈旭暉對西藏主權的建議

文/DD Ting

沈旭暉在2008年5、6月期間於《亞洲周刊》一連四期(第二十二卷十九至二十二期)就西藏主權提出不同的參考事例(另有數期亦談及西藏問題),在此我想概略地講述這些主權形態的歷史背景,並對其應用於西藏的可行性作簡單分析。

(一)「非洲虛君」模式

此模式流行於非洲,沈於文中提到南非的祖魯王及烏干達的卡巴卡兩個案例,其實它同時亦出現於其他洲份的一些國家,如孟加拉和印尼,甚至美國亦承認境內印第安部落的「部落主權」(tribal sovereignty)。這個模式通常應用於一個種族(race)/部族(tribe)的聚居地,其「現代發展水平」(以西方標準而言)相對落後,其原有領袖(土王/酋長)被賦予象徵性的地位和「捍衛傳統」的職責,可保存其「內廷」作為起居和幕僚機關,但不擁有管治該地的實權,該地政府則另行依據特定法律組成,直接向中央政府負責。

一國之中央政府為何容許這種國中之「國」的出現?從已有的案例來看,通常中央政府都會封給這些種族/部族領袖以極為崇高和尊貴的名號,配之以各種浮華的傳統儀式,並給以若干特權(如土地擁有權),透過權位輸送來達致籠絡種族/部族上層和凝聚民心的目的。然而,這個模式的精髓,在於絕不給予該領袖及其上層社會以任何實際的公權力,特別是保安力量、涉外關係和立法權等,此等權力仍由中央政府(一般通過該地以某種形式產生的政府)牢牢地把持著。大家可能覺得此模式似曾相識?沒錯,類似安排其實存在於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內,就是香港的「新界原居民」,其「村長」(村代表)由原住民選舉產生,負責在對外代表村民及在村裡「排難解紛」,並由「鄉事委員會」至「鄉議局」逐級建成自己的專屬代表機制,同時原居民亦被給予「丁權」,凡此種種,都跟非洲和印第安那些「部落主權」非常相似。

從以上可以看出,「非洲虛君」模式,說穿了,就是藉由一種虛幻的名號和若干利益輸送,假借「主權」、「獨立」之名,以魚目混珠,跟國際法的「主權」涵義風馬牛不相及,其實際權力甚至比一般地方行政單位為少。對於熟悉現代國際關係中的主權模式和遊戲規則的流亡藏人社會而言,此模式沒甚吸引力可言。

(二)「教廷/梵蒂岡」模式

如果你熟悉歐洲歷史的話,相信都知道在羅馬帝國滅亡後,在意大利半島曾經有一個存在超過千年的「教皇國」(Papal States)。1870年,意大利王國的軍隊佔領「教皇國」的領土,實現意大利的統一,當時的教皇(現今稱為教宗)碧岳九世(或稱庇護九世)留守於羅馬市內的梵蒂岡城(Vatican City),足不出戶。由於意大利人民絕大部份為天主教徒,王國軍隊不敢貿然攻入梵蒂岡城,以免激發民眾的不滿。後來王國政府頒布《保障法》(Law of Guarantees),賦予教皇等同意大利國王的地位和特權。然而,碧岳九世拒不承認該法律和王國的合法性,自始包括他在內的五位教皇都以「梵蒂岡的囚徒」(Prisoners in the Vatican)自居。加之當時歐洲列強鑒於教皇對西方社會,特別是她們境內的天主教會和教徒,甚至新教中的保守教派,仍具有相當的號召力,故此她們亦樂意繼續承認「教廷」(Holy See)的主權並跟其維持外交關係,使教廷事實上維持獨立地位。

因此,教廷「有主權,沒土地」的形態並不是由意大利單方面容許和賦予的結果,而是教廷巧妙運用自身影響力和國際形勢的作用使然。及至墨索里尼統治意大利時期,他出於聯結教會勢力鞏固自身統治地位的目的,而教皇亦樂意解決梵蒂岡城的領土地位,因而雙方「一拍即合」,於1929年簽署《拉特蘭條約》(Lateran Treaty),建立「有主權,有土地」的「梵蒂岡城國」(State of the Vatican City),由教皇(教宗)委任的一個委員會管治,而「有主權,沒土地」的教廷(Holy See)則繼續跟世界各國維持外交關係,及後更成為聯合國的永久觀察員。「梵蒂岡城國」和「教廷」各以主權實體的身份並存於國際體系。

跟西藏的情況相比較,我們可以知道:

- (1) 所謂的「教廷(有主權,沒土地)/梵蒂岡(有主權,有土地)」模式,其形成有著非常獨特的歷史背景。
- (2) 教廷自始至終為主權實體,而中國作為西藏宗主國的地位一直為現代國際社會所承認。
- (3) 教廷持續不斷跟各國維持外交關係,而她至今皆不接受各邦交國以同一人同時擔任駐教廷和駐意大利的大使,以免混淆其主權地位。
- (4) 梵蒂岡城國的建立,是意大利主動割讓領土主權的結果,對於向來秉持「天無二日」和「正統」等傳統思想的中共而言,要其讓出領土主權,哪怕只是一點點,於今而言,實是匪夷所思。

(三)「馬耳他騎士團」模式

跟教廷一樣,馬耳他騎士團(SMOM或Order of Malta)是屬於「有主權,沒土地」的主權形態。騎士團原本擁有領土(先後為羅德島和馬耳他島)而後喪失,其能保有主權的原因在於:

- (1) 作為十字軍東征的代表,騎士團早期負責聖城耶路撒冷的防衛,其後跟穆斯林對抗長達八個世紀,曾數次以寡敵眾擊敗敵軍,立下赫赫戰功,加上其成員皆為獻身東征事業的貴族,因而其在歐洲社會享有崇高威望。
- (2) 騎士團失去馬耳他後(1789年),受到俄羅斯沙皇保羅一世(Paul I)的庇護,使其能保存實力。
- (3) 當時歐洲各國和騎士團本身仍相信其能捲土重來,流亡只屬暫時性,如同二次大戰時歐洲大陸各國於倫敦成立的流亡政府,因此各國樂意繼續跟其維持外交關係。
- (4) 1843年,騎士團在羅馬(當時由教皇國統治)設立總部並獲得「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雖然教皇國於1870年被消滅,但基於意大利對教廷的政策,騎士團的「治外法權」地位亦得以維持。
- (5) 騎士團自失去軍事功能後,主要從事慈善事業(像國際紅十字會),這有利於跟各國建立關係,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樂於給予其外交承認以換取人道援助。
- (6) 雖然騎士團在天主教會內為隸屬於教廷的團體,然而在外交上教廷亦承認其擁有「功能主權」(functional sovereignty),並且相互派遣大使,教廷的背書亦有利於鞏固騎士團的主權地位。
- (7) 跟西藏的情況不同,騎士團的成員主要來自西方各國且大多有貴族身份,非常國際化和具影響力,因而備受西方社會所認同。

由此觀察,「馬耳他騎士團」模式跟教廷一樣,是西方社會和歷史的獨特產物,自此以後,包括歐洲在內的國際社會亦未再出現類似事例。以今天國際社會對「主權=國家」的普遍理解,成立一個新的「有主權,沒土地」的主權實體以爭取國際承認,恐怕比承認歐盟為主權國家更為困難。

(四)「白俄羅斯/烏克蘭」模式

1945年,蘇聯及其轄下的兩個加盟共和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同時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這是斯大林欲擴大蘇聯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的結果。斯大林的原意,是運用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類似「邦聯」(confederation)性質的模糊身份,通過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的憲法,賦予她們以外交權力,從而使她們全數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加入聯合國,而蘇聯本身則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成員。

由於這個想法將對國際實力平衡與及國際法對主權的定義造成巨大衝擊,美國即時提出其五十個成員州(state)亦同時加入聯合國以作出外交反擊。經過討價還價,最終美蘇雙方達成妥協方案,美國以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在二次大戰時曾為抵禦納粹德國作出重大貢獻為由,同意其成為聯合國的成員。至於沈文所提及的美屬菲律賓和英屬印度亦於未獨立前加入聯合國兩個案例,首先,美國國會於1934年通過《菲律賓獨立法案》,將菲律賓提升為「自治國」(commonwealth)地位,準備讓其於1944年正式獨立,只是因二次大戰時菲律賓被日本佔領,使其獨立進程有所延緩。因此在法理上,菲律賓在參加聯合國時已具備「准獨立國」的地位。至於英屬印度,雖然在其成為聯合國時仍為英國的殖民地,然而,英王是以「印度皇帝」的身份對印度進行管治,其憲政地位跟其他英國殖民地不同,加上英國於1944年已決定撤出印度讓其獨立,如同菲律賓一樣,印度成為聯合國會員時亦早已具有「准獨立國」的身份。因此,除非中共準備讓西藏獨立,此二案例恐怕並不適用。

從以上背景介紹可以得知,「白俄羅斯/烏克蘭」模式

同樣脫胎自獨特的歷史環境,很大程度上是強權政治的妥協結果,及後亦沒有再出現同類案例。而此模式是否能應用於西藏,取決於:

- (1) 中共有否意願讓西藏擁有一定程度的主權和外交權。
- (2) 作為受眾的流亡藏人社會(特別是激獨團體)是否接受仍被置於一個更高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排。

雖然學術界有不少評論,認為國家主權業已因科技的飛躍發展以及各種非國家個體(non-state actors,例如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的崛起而逐漸消失,可是,過去二十年,世界上仍陸續出現新國家,同時各地亦有不少族群繼續為追求獨立而奮鬥,對於弱勢族群而言,主權國家的身份仍甚具吸引力。與此同時,先進國家雖然傾向通過把權力讓渡予區域組織(例如歐盟)以壯大實力,這實際上卻使區域組織變成面積更廣、人口更多、經濟規模更大的「聯邦國」(federation),主權國家的本質依舊。而更為弔詭的是,科技一方面削弱了國家對社會和經濟的控制,另一方面國家卻又運用科技來加強其資源分配和調控的功能,特別是在提供福利、維持社會秩序、環境保護等方面,國家的影響力仍無遠弗屆。畢竟,現今的國際體系仍以主權國家作為主體,弱勢族群奪取主權以獲得發言權,是最直接的方式,這足以解釋為何激獨分子明知西藏經濟條件未必能自給自足,依然如此執著於實現獨立。

從歷史背景和當下的國際形勢來看,基於中共對主權的絕對堅持,以及大國間相互制衡的客觀現實,西藏成為主權國家的可能性近乎零。達賴喇嘛十分清楚這點,亦明白西藏獨立未必真正有利,因而他提出落實真正自治的訴求,相信只要不觸及主權問題,便能有談判的空間,我十分贊同他的這個想法。眾所周知,現時西藏是有自治之名卻無自治之實,如何落實真正的自治,可參考國際上的不同模式,比較可行的有:

- (1) 像英國的「構成國家」(constituent countries,如蘇格蘭和威爾斯)、西班牙的「自治社群」(autonomous communities,如加泰羅尼亞和華倫西亞)、印尼的亞齊特別行政區等,設有本身議會和政府,讓其自行管理財政預算和地方建設,以本身語言為地方法定語言,亦可釐定自己的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政策。至於法律制度、國防和外交等,則屬中央政府的管轄範圍。這其實跟現今大陸自治區的法定權力相似,因此關鍵在於能否真正依法貫徹自治而非徒具虛名。
- (2) 讓西藏成為像庫克群島(Cook Islands)和紐埃(Niue)般主權隸屬新西蘭的「自由聯系國」(freely associated states)。但這仍涉及「國家」的形式,恐怕未必能為中共所接受。
- (3) 成立類似「法語共同體」(La Francophonie,為聯合國永久觀察員)這種由全球法語社群組成的國際組織,可稱之為「華社共同體」,以社群(communitiy)為單位,成員可包括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海外的華人聚居地(如新加坡和檳城)、流亡海外的少數民族社群(如西藏流亡政府)等,作為讓這些社群相互溝通和參與國際事務的平台,然後再逐步解決境內的自治問題。
- (4) 希臘境內的「聖山自治修士國」(Mount Athos,全稱為Autonomous Monastic State of the Holy Mountain),是東正教的聖地,當地設有不少國籍的修道院,這個「修士國」就是由各修道院派代表組成「神聖群體」(Holy Community)作封閉式管理,不論是希臘國民還是外國人,同樣需要申請許可證,才能進入「國境」。這裡的主權仍然屬於希臘,但在宗教事務上,則隸屬身處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正教「教宗」-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所管轄。這種結合地方自治和擁有完全宗教權的模式,跟元朝至民國歷代中央政府的治藏制度相似,比較可取。

隨著達賴逐漸老去,解決西藏問題,已是刻不容緩,但願北京和達蘭薩拉都能拿出政治智慧,為藏漢兩族人民的幸福及和平發展找出「共存共榮」的方向。■

「中華民國萬歲！」

~ 2008 台灣大選有感

文/Keith

蒼天庇佑，國民黨的馬英九終於勝選，將成爲民國第十二任總統。

失去政權達八年的國民黨，可謂再次於「八年抗戰」後，凱旋而歸。六十年前的抗戰，中國是戰勝了，卻輸了政權；如今總統選舉是贏了，但能否穩固，得看政績。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中華民國得以延續，三年後，必到臺灣慶祝雙十節。

既未能往臺灣觀戰，只好留在家中收看電視新聞。看著馬英九的得票不斷攀升，興奮之情難以言喻。達六百五十萬票的一刻，真的太振奮，也不自覺地喜極而泣—是的，等了四年，更擔心民國之興亡，淚水奪眶而出—是好幾次，德亦略受感染。我也沒有想到自己竟情不自己，但真的感到無比的安慰和歡欣。

除了馬氏勝選，國民黨的重振亦標誌著臺灣民主的成熟和完善。觀乎兩黨的選後言論，溫和而尊重，並對民主制度加以肯定，這是可喜的，亦預示中國人是能夠實行民主制度，過程中或有顛簸，但制度帶有自我完善的元素，讓人民得以用選票表達意志。看著電視上直播每個縣市的兩黨得票，幻想著若然換了「上海市」、「河北省」，則中國終能實行民主制度，這將是繼民國開創後，另一件改寫中國歷史和國運的事件。不知有生之年，可否達至？

看來亦沒有人想到馬氏能贏取多達二百二十萬票（賭選莊家必大輸），只好說，陳水扁確實是馬英九的最佳助選員。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和朋友，此次大選實是最佳寫照：八年前，「臺灣之父」與「臺灣之子」如膠似漆，綠地鋪天。民進黨四大天王，星光熠熠；國民黨則百年老店，危在旦夕，黨內分裂，內訌不斷；算如今，「父」、「子」反目，陳氏如過街老鼠，民進黨四天王分崩析離，就連李登輝如此狡詐之徒，對謝氏「欲挺還止」，還申明說是個人意見，並非呼籲。一切，都是政治權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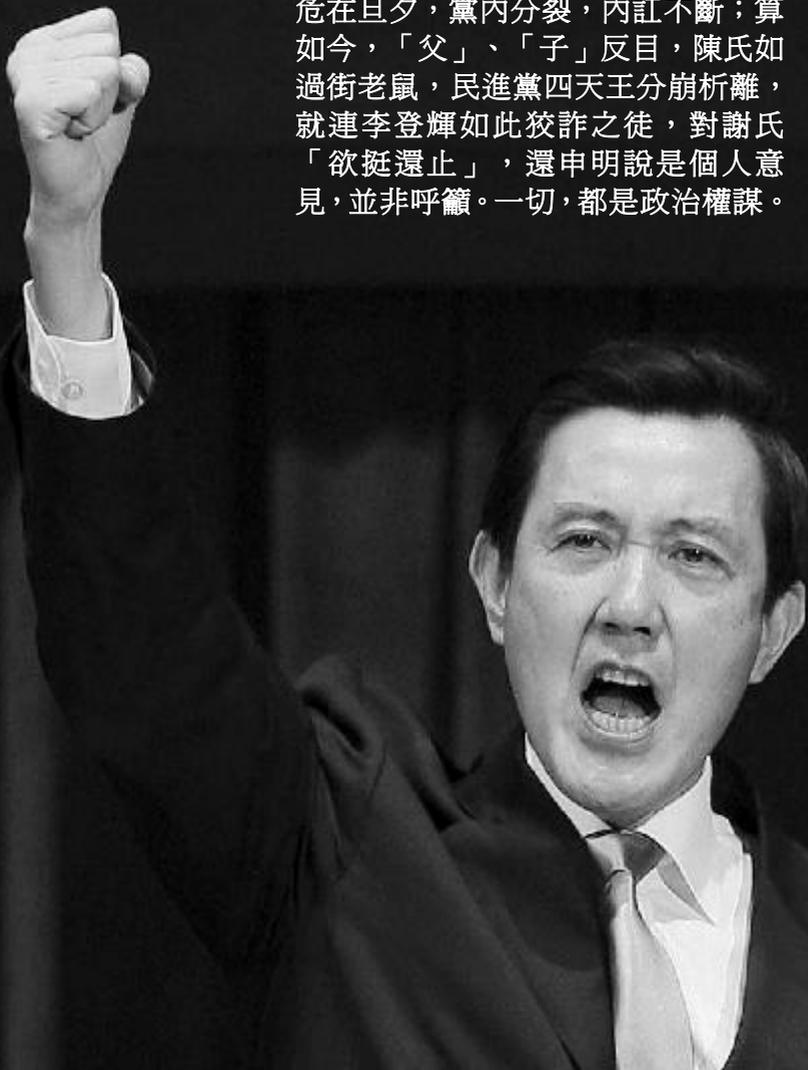
國共兩兄弟，前者總算經歷洗禮，是否真正胎換骨，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他們能夠重奪政權，是經過磨練和痛苦。中共建黨八十六年、建政五十九年；建政以前的各種民主口號，喊得動聽，待至驅趕國民黨，頓時失去制衡，狐狸尾巴便伸出一與民進黨何其相似，慶幸是民主制度已植根於臺灣，最終仍能以選票—成本較低的一種政權轉換的方法—取而代之。試想，當年若蔣、毛二人能拋開一己私利，精誠合作，數億人民不用受苦受難。但歷史總要與中國人開開玩笑，只是代價實在太大。

曾說過，說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時間還遠，亦不用自我貼金。但二〇〇八年的第一個威脅，總算有驚無險，亦增加了兩岸對話的條件和基礎。設若奧運成功，則未來百數十年的國運自當興隆，亦非外人所足道也。最重要是自強不息。

九十多年前，創造民國的一眾先烈，國父理想終能實踐於民國土地上，只可惜仍局限一隅，以待將來於大陸土地上開創。

甚喜歡國民黨於選後所揭櫫的「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

中華民國萬歲！
〇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民九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
全力支持母會！

國事校友會是由一群從事各行各業的畢業同學所組成，宗旨是支持我們的母會—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發揮同儕間的互助精神，延續我們對社會的關懷。

如果你即將畢業，就請一齊來參加國事校友會！

網址：aacs.guoshi.net / 電郵：aacs@guoshi.net

(廣告)

電視新聞報道公式化

文/YEUNG

香港的新聞報道，越來越趨向一條公式：
model answer + model + model question = model news

每報道一件事，記者都事先有一個「model answer」，再根據這個「model answer」，找一個或一些「model(s)」，再問他/她們一條或一些「model question(s)」，從他/她們的口中得到記者所預設的「model answer」，就可以成為「model news」。現舉數例如下：

例一：雞貴左

每到農曆新年、端午、中秋、冬至等重要中國傳統節日，記者一定預設「雞貴左」，但因為要過節，仍然有許多人買「雞」的 model answer，然後到街市找一名雞販 model 問一條 model question：「D 雞有冇貴左？」雞販 model 必答的 model answer 是：「梗系有啦，過節嘛。」記者會再問一個買雞的師奶 model 問兩條 model questions：「D 雞有冇貴左？」師奶必答的 model answer 是：「梗系有啦。」記者會接著問：「咁點解重要買呀？」師奶 model 必答的 model answer 是：「過節嘛。」問和答的字眼未必每次都完全相同，但內容必定一致，成為經常出現的 model news。

例二：影響生意

香港的中區灣仔一帶有遊行、台灣有遊行、泰國有政變、所羅門群島有暴亂、紐約停電等等，不論事情大小、距離遠近、人數多寡，記者都會預設一個必不可少的 model

answer：「梗系有影響生意。」然後到街上找一名小店的老闆 model(如是外國，就一定是華僑，而且是較年長的)，問一條 model question：「有冇影響生意？」小店老闆 model 必答的 model answer 是：「梗系有啦。」問和答的字眼未必每次都完全相同，但內容必定一致，成為經常出現的 model news。

例三：天氣凍左

在香港，氣溫稍有下降，記者都會預設一個必不可少的 model answer：「天氣凍左。」再加上一句「introduction」式的引言：「天氣凍左，市民出街都著多左衫。」然後到街上找一些穿得特別臃腫的路人甲乙丙 models，問一條 model question：「你著左幾多件衫呀？」路人甲乙丙 models 必答的 model answer 多是「五件」、「六件」或「七件」。記者會接著問：「點解要著咁多衫呀？」路人甲乙丙 models 必答的 model answer 是：「覺得凍囉。」問和答的字眼未必每次都完全相同，但內容必定一致，成為經常出現的 model news。

還有很多其他例子，難以在此一一列舉。

「model answer + model + model question = model news」的「新聞」公式，真像香港的公開試公式：

model answers + models(考生、家長、補習天王、教師、官僚) + model questions = model news(放榜、狀元、會考成績唔重要……)

記者「過年」公式

記者：D 雞有冇貴到？

雞販：梗系有啦，過節嘛。

記者：咁點解你地(市民)重要買呀？

市民：過節嘛。

警惕「獅子山下」魔咒

文/Victor

近日有論者在《香港商報》發表文章，以近期香港發生的事件，例如欺騙綜援、雷曼苦主追討賠償等，論說「拚搏」和「靠自己」等「獅子山下」核心價值已經漸漸被「伸手」、「靠別人」、把事情政治化等「新核心價值」所取代，要大家小心警惕云云。(註)我對這些言論不敢苟同。

港人核心價值沒變

第一，我認為大部分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根本沒有改變，只是政治經濟的形勢變得越來越不利港人發展和拚搏。香港經濟在五六十年代起飛，當時的港人雖然貧困，但是向上流動的機會卻比現在多。那時歐美的經濟開始成熟，工資變得越來越高，不得不把生產工序搬來擁有眾多平價勞動力的東亞地區，例如香港。那時，香港人可以在工廠裡打工，或者在家裡「穿膠花」做手工業，當時在工廠打工的工資並不比白領低，努力的話更可以升做「Line長」、賺錢買樓，或者開一間茶餐廳，做一點小生意，而住在鄉郊地區的市民，務農捕魚亦可以維生。可以說，五十年至七十年代的香港人生活條件雖然差，但發展機會卻較平等，對前景亦比較有希望。但在八十年代以後，情況則大為改變。首先，一部份華資企業，由於經營有道，漸漸開始壟斷市場，變成大財團。而在高地價政策(政府控制土地供應)的影響之下，土地變得非常昂貴，使香港的商舖和房屋價格急升，漸漸脫離了普通市民的負擔能力。高昂的租金亦大大提高了小市民創業的成本，這反過來又強化了大財團的壟斷，更不用提「領匯」私有化的影響了。另外，由於港英政府缺乏長遠政策留住工業，使大量港資工廠在內地改革開放後遷往工資和土地都比香港平宜的珠三角地區，低下階層的就業機會因而大減。這些因素都減少了港人(特別是教育程度低的那一群)向上流動的機會，亦影響到他們的「拚搏精神」，因為即使拚搏，成功機會亦已減少。



圖(網上圖片)：獅子山下的公共屋邨。公屋是基層港人的安樂窩，其商場亦為小商戶提供謀生機會。

騙綜援不普遍

第二，欺騙綜援絕對不是普遍現象，不能視為港人價值觀改變的證據。我們不能否認有一少部分人是在騙取綜援，但絕對不是大多數。正如香港警察多數都是盡忠職守的，但卻不能排除有一些害群之馬。另外，綜援金的數額絕對不多，僅夠基本生活，更要受到社會的歧視，稍有骨氣的人絕不會滿足於這種生活狀態。而香港是個相對富裕的社會，對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應當提供幫助，難道要窮人在街上「拾氣水罐」才能顯出港人有拚搏精神？再進一步，一個人領取綜援，甘願做個受盡歧視的「懶人」，過一種非常簡樸的生活，其實亦不算是罪過，一個富裕、進步的現代社會應該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批評者亦要記緊，《基本法》第36條規定享受社會福利是港人的權利，絕對不是施捨。至於社會變得政治化，看似是混亂的象

徵，是負面的，但其實可能是市民對自身的覺醒和不願做順民的表現，是正面的。以往香港市民和政府習慣把所有社會現象和議題「非政治化」。例如把商人的成功完全歸因於他們的努力和才智，而忽略當中的政治和社會因素。那篇《商報》評論中提到的那些「政治破壞法治」的例子，除了雷曼苦主圍堵銀行可能成立外，其他例子如要求中信泰富的榮智健下台、立法會用《特權法》查雷曼和以司法覆核阻撓領匯上市等，都是法律許可下的正常政治行為。其實市民在法治手段以外，懂得用合法的政治手段爭取權益，應被視為社會進步的表現。君不見社會權貴和大財團也用許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手段例如遊說中央政府和加入諮詢委員會來為自己爭取利益嗎？權貴能，為可小市民就不可呢？

時代變了

時代變了，我們不能過分神化「獅子山下」傳奇，亦不需要太過害怕社會變得政治化。我們要警惕的，反而是當權者可能利用「獅子山下」傳奇所提倡的「拚搏」和「靠自己」等精神來把應負的責任推卸到個人身上。■

註：李明生：〈警惕如此「新核心價值」〉，《香港商報》，2009年1月7日

延伸閱讀：

Lam, Wai-man. (2005). *Depoliticization,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in Hong Kong*. *Citizenship Studies*, 9(3), 309-322. (<http://hub.hku.hk/handle/123456789/48663>)

對陳鑑林〈設反饋機制，遏領匯加風〉一文的回應

文/A1

(編者按：民建聯籍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曾於2008年12月30日《文匯報》的「文匯論壇」發表題為〈設反饋機制·遏領匯加風〉的文章，批評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回購領匯股份以恢復政府對房屋署轄下商場物業控制權的建議，認為領匯的管理比房署時代進步，回復過去由房署直接管理的方法，未必能帶來最佳效果，因此支持在繼續由領匯管理的基礎上，設立機制讓商戶反饋意見，從而釐定租金水平。以下是作者對陳文的回應，副題為編者所加。)

陳公之見，不敢苟同

公屋商場，自負盈虧，本是底線；但同時，公屋商場也是基層市民的生活之本，理應有便民、利民的功能，提供有別於市場普遍高昂的消費水平的選擇。在不虧蝕，不需長期依賴公帑資助的前提下，租金自然是越低越好。政府建設公共房屋，不可能把公屋商場這個必需的便民設施棄之不顧，假托小政府、大市場謬論卸責。

將公屋商場私有化，並且以領匯房地產基金形式上市之後，這些商場便需要按照賺錢至上的原則營運。有買領匯股票的朋友都知道，領匯派息爽手，除了高層員工厚薪之外，基本上所有盈利盡都分給股東。這些股息從何而來？就從基層市民多付的消費上來。

另一方面，予小商戶以生存空間，對保障市民就業、維護小市民尊嚴、促進社會多元發展有利，政府也是責無旁貸。憑藉勞苦，經營得法，小商戶本來盡己所能，自力更生，雖未稱馳騁縱橫，倒也可以偏安一隅，自主發展。公屋商場硬銷高檔，無疑強迫小本經營的商戶放棄本業，投身打工仔行列，這與當年圍地運動迫使失地農民進城打工，有何分別？

再說，私有企業管理一定比公營事業好這歪理，實在難以服人。私有企業效率高，是因為它們唯一任務就是在不犯法的前提下賺最多錢。公有機構效率低下，卻往往因為權責不清，庸官劣吏廢事而沒有監察而至。只要改善管理制度，釐清權責，開放透明地運作，公有機構的效率是可以改善的。公屋商場應該私有還是公有之辯，核心應在其主要功能的考量之上，而不在其管理效率。為了解決官僚誤事，索性把本有公益功能的公有資產變賣，引入只為逐利的私人企業，是驅了一狼，反添一虎。房委會管理不善，陳公雖斷對症，卻下錯藥，把公屋商場應有的公益功能置之不顧了。

陳公又說：「過去有立法會議員試圖要求政府作為九鐵、港鐵的持份者干預管理層，但據經驗，政府在九鐵港鐵管理事宜上仍非『為所欲為』的。」此論點實在不知所言，似是而非。縱然是管理公有資產，政府也當然不可能為所欲為。但是如果政府作為商場的擁有着，逆市加租三、四倍這些絕子絕孫的陰實事，政府總可以在 Boardroom 跟高薪管理層反枱吧！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民主黨都已經就當年支持領匯上市而向市民道歉了，還說什麼「走回頭路」、「當時得到市民支持」？我不會像黃毓民一般叫支持領匯上市的議員剖腹，但是執迷不悟，繼續為當年劣政護短，以為用什麼不切實際的「優先收購權」去限制領匯加租，就可以疏導民怨，無疑是政治自殺。

前朝政策，遺禍至今

談及領匯，追根究底，無可避免又要觸碰到香港長久以來最敏感的爭議，就是高地價政策與其如何扭曲自由市場。香港被規劃塑造成一個「地少人多」的城市，限制土地供應，密集發展以哄擡地價，人煙稠密而一地難求。私人住宅樓價不斷攀升，供樓變成港人一生最大使命；加上嚴苛打壓街販的政策，商業用地極為稀缺。市民日常消費之地，大多為私人商場，商場內盡是連鎖店、品牌貨；供市井小民取樂消費的街頭販攤、大排檔漸漸減少。我們把這種扭曲土地供應的規劃政策，雅稱為「高地價政策」。

英國佬久歷現代經濟制度，早已磨練出一套治術，明白政治需要平衡 (Trim)，簡單來說就是要見好就收，避免物極必反。如果全港土地樓房盡是高價，民脂民膏，必然侵蝕殆盡，傷及根本，易生動蕩。於是租公屋、賣居屋、闢荒土、建新市、修配套，以圖久遠，然後得廣廈以百十計，大庇天下寒士。自此小民雖或無恆產，卻總算有安身立命之所。香港居民，遂有半數居於公營資助房屋之中。

其實基層市民早已不敢奢望買私人樓，地產商亦明知殺雞也無卵可取，遂任其漏過其房產市場的網羅，放開一面。然而，雞肋無肉，棄之有味，小民買不起樓，一日三餐、家居所需的開支，縱非大財，山大斬埋有柴，食得唔好咗，地產商自然不會放過，遂有房委會出售商場、領匯私有化之議。領匯私有化之後，公屋商場轉型，不再單純以服務基層為本，競相變身，忽然高檔，於是小商戶危在旦夕，民怨日深。

要市場順暢、平穩地運行，先決條件是社會不穩因素不會使該市場崩潰。物極必反之理，亙古不變。若滿城皆有露宿街頭的寒士，何能保天高之樓價？四野盡是食不果腹的草民，焉可容奢華之市肆？要哄擡住宅價格，宰割肥羊，也須穩住瘦骨嶙峋、無脂可吸的草根市民。同理，要讓商場地主有經營空間，也要留有餘地，提供廉價公屋商場讓一眾蟻民消費生活，也使小商戶有自主營生之門。此理簡單，稍諳平衡治術者，無論是為民請命者，還是利用制度謀利者，都不可不察。

由於政府早已利用密集的規劃、打壓街販等政策，營造了一個高消費的市場環境，在此背景下，提供較為廉租的消費場所，不過是稍作修正，網開一面，避免魚死網破的平衡之法，差強也可以說成社會福利。違反自由市場原則、扭曲市場的罪魁是高地價政策，提供公屋與公屋商場不過是補救政策而已。有謂為商戶提供低於市值租金，是向小商戶和消費者提供福利，政府需要向納稅人解釋，當然合理不過；但為何貽害不淺的高地價政策，反不受詰難，理所當然？

領匯應該公有還是私有，不是姓資姓社的理論問題，也不是能不能反映政府不動產真實價值的問題，而是關乎民生根本，統治基礎的核心問題。縱然公有公屋商場在市場上不值一文，其穩定民生的功能，對政府來說已是無價。尤其當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之時，領匯私有化後帶來的物價上漲，絕對可以掀起風波。

至於有關出售商場以融資，以供日後發展公屋之用的觀點，愚意以為不可。據以往興建公屋的經驗，資助形式主要是政府提供免費土地，以供房委會興建公屋和商場及停車場等設施，爾後政府基本上就沒有財政負擔，甚至可與房委會分享轄下商場及停車場盈利中的一半。由於租金遠低於市值，營運公屋連年虧損，唯有以公屋商場、停車場等設施的盈餘彌補。將盈利部分賣掉，公屋租金又無法可加，未來房委會如何做到自負盈虧？把有盈利能力的部分賣掉（先別論有否賤賣），一次過收回資金（2007/08年度的防房委會的資金投資回報為1.9%，盈餘9.39億元），但卻留下連年虧損的產業，坐食山崩，是何種營商模式？先不說未來興建公屋，沒有了商場、停車場等收入，就是要支持每年經營現存公屋的虧損，已足教房委會吃不消了。特別是下一年經濟下滑，投資回報肯定下降，房委會的財政只會更加不穩定。

至於說出售商場貨如輪轉，則房委會豈不是成為積極參與市場的發展商，與地主爭利？況且，如果我們不嫌房委會零地價獲得土地以發展商場出售圖利，是違反市場機制的話，則房委會之財困不難解也，政府只需多撥幾塊上乘旺地給房委會蓋商場及停車場，責成其妥善經營，並且免收那一半盈利，則不費一分公帑，財困自消，何須出賣資產？

一直以來，房委會自負盈虧的營運模式，沒有什麼大問題，也沒有要求政府不斷注資，浪費公帑的問題。2003年，亦即孫明揚決定要出賣房委會資產的當年，政府的新聞稿中，其實也明確道出房委會「承受現金流量赤字」（這句話須由陳雲先生來解一解毒）的原因，乃是房委會決定停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單位。<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news/pressreleases/0,,2-0-6929--0,00.html>再看2001/02年度房委會的年報，商業樓宇業務，包括商場、停車場、工廠和福利/社區設施的營運盈餘，達到20.17億，超過了租住房屋業務的18.53億赤字。2007/08年重售居屋，不計算資金管理帳目，房委會仍有24億盈餘。這說明，只要管理得宜，房委會不賣商場和停車場，也是可以做到長遠收支平衡的。

未來幾年，經濟衰退無可避免，經濟轉型又遙不可及，結構性失業問題難以一時三刻解決，基層工資只望力保不失，遑論不跌反升。民生三大事——就業、工資、物價——政府必須果斷而行。回購領匯，乃是大勢使然，如其等待民怨沸騰之時倉促而行，不如早日從善如流。■

CH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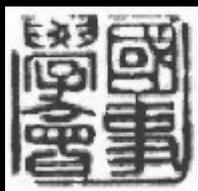
跳出框框，突破自己！
沒有參與，哪有改變！

唱衰香港？唱好中國？就睇你！

上國事莊，做國事人，傾莊熱線：

Philip (9388 5685) / Doris (9173 5811)

Email: css@hku.hk



國事學會一直秉持「感性認知，理性批判」的精神，想深入了解我哋，就要睇下我地本 30 週年紀念特刊，網址是 http://www.guoshi.net/e_journal.pdf

(招莊廣告)

國事學會第 38 屆幹事會

- 主席 : 楊汝成 Brandin
- 內務副主席 : 周曉薇 Doris (兼署理財務秘書)
- 外務副主席 : 黎展康 Tiger
- 出版秘書 : 張鼎海 Bruce
- 去屆幹事會代表 : 陳允恆 Philip
方甥兒 Yuki

《國風》編輯室

- 總編輯 : Philip
- 編輯 : Brandin
Doris
Tiger
Sarah
Dennis

特別鳴謝

VICTOR
及
各文章作者